导　　论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殖民主义者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也由此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世界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大转折”“大过渡”和“大变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②]资产阶级凭借着“坚船利炮”，按着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手段改造着旧的世界秩序。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当时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方诸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就必须迅速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但从世界历史上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极度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不允许这些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自生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③进而实现现代化。而在学习和摄取西方文明之前，东方国家必须首先调整、改变传统世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的、客观的估价，形成新的世界观，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西方国家新的近代世界观的形成和摄取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各有异同，许多民族常常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勃兴以来激变的世界文明格局有了清楚的认识，才改变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排斥态度，结果在时间上错过了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时机。由此可见，抛弃农业时代狭隘的传统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大胆摄取西方工业文明，并进行细致的消化咀嚼，使之在本土生成现代文明之根，是东方国家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工业社会最为关键的历史课题。

本书拟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对 16 世纪至 20 世纪中日两国摄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一宏观比较研究，并借此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

应该承认，自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研究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何以成功、中国维新变法何以失败的原由开始，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兴起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浪潮，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政治家、思想家一直没有中断对中日现代化不同命运的历史探索，并已经取得了一批颇具深度的研究成果。

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之剧烈变迁，史学主体之于史学客体的认识和阐释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更加深化，如同人类之于真理的认识和阐释不会终结一样。作为一个研究时段长达 400 多年,贯通东西,兼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性研究课题——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以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此，笔者在平日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以下 3 个方面对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明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首先，注意研究揭示中日两国摄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动态纵向发展进程

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等具体的‘事件比较’问题上，而忽略了对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纵向发展过程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审视,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上，难以窥见两国摄取西方文化动态发展演进的规律,总结其得失教训。鉴此,笔者在本书中力求变‘事件比较研究”为‘过程比较研究”,将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分为 6 个时期加以比较研究考察，并注意揭示各时期之间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

(1)“拉丁文明”时代

此时期主要是指从 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侵略者来到远东,到 17 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采取‘锁国闭关”政策前

的百余年的时间。从比较角度看，中国接触西方略早于日本。1517 年 8 月，当葡萄牙人冒充满剌加贡使，以朝贡为名始通中国时，日本人尚未与西方发生直接联系。直到 1543 年，3 名葡萄牙人乘船抵达日本鹿儿岛县南之种子岛时，才揭开了日西关系史的序幕。当时的中国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贸易和传教的主要目标，在与西方的接触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这决定了此时期两国摄取西方文化不同的演进轨迹。

这一时期在西学东传进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比较观之，来华耶稣会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博学多识之士，他们为了在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赢得信徒，主要接近封建士大夫，采取“学术传教”方式，大力译刊西书。而在日本，由于战国时代的诸侯纷争，均渴望得到枪炮和贸易利润，故耶稣会士主要接近的是地方诸侯大名，没有采取“学术传教”策略。这导致传入中日两国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在中国，通过耶稣会士译刊的 120 多种科学书籍，西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武器军火制造技术等开始传入中国，构成了这一时期输入中国西学的核心内容。相比之下，这一时期进入日本列岛的西方文化多是铁炮、望远镜、钟表、世界地图等实用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此时期中国摄取西学在层次上要高于日本。但从西方文化对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看，两国的情形却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此时期所输入的西方文化虽然不如中国高深，但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主要表现在：枪炮技术的传入，改变了日本传统的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战术，加速了日本由战乱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世界地理知识的输入，则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狭隘的“三国世界观”，令其视野

大开，为日本进一步摄取西方文化准备了条件。而在中国，入传的西学仅在李之藻、徐光启等极少数醉心西学的开明士大夫中得到理解和认同，绝大多数封建士子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学为无用之‘奇技淫巧”,可有可无之物,社会影响甚微。

(2)“锁国闭关”时代

所谓‘锁国闭关”时代,主要是指从 17 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确立锁国体制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长达 200 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德川幕府和清政府先后采取了严格的对外限制政策，对中西、日西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中日“闭关锁国”政策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皆以对外封闭限制为宗旨，因而，学术界通常将二者相提并论，统视为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腐朽统治所采取的消极被动的自卫措施。而笔者则认为中日“锁国闭关”政策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锁国闭关”政策产生的思想基础不同;‘锁国闭关”体制下两国的对外认识防卫机制不同;‘锁国闭关”时代两国对西学的态度不同。

从比较角度看;‘锁国闭关”时代中日两国的‘西学观”和摄取西学的政策已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日本在“锁国时代”，其西学政策演变以 1720 年德川吉宗‘洋书解禁”为标志,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锁国时代前期(1633 年至 1720 年)。1633 年,在德川幕府颁布的“锁国令”中曾明确规定除荷兰文的医药、航海等书籍之外，不准输入其他欧洲学术文化，这标志着西学大规模输入日本的“拉丁文明”时代的结束。但锁国并非常人理解的那样密不透风，幕府虽然断绝了与欧美国家的往来，但却保留了与荷兰的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在幕府的直接控制下，通过长崎这个贸易窗口，西洋现代文明如同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荷兰驻日商馆还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风说书”,汇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使得幕府在闭锁的环境里，仍可由长崎一孔瞭望世界，在世界风云变幻异常，民族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第二阶段是兰学勃兴时期(1720 年至 1853 年)。1720 年,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禁书中除与基督教有关系的部分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为日本大规模摄取西方文化准备了条件。1811 年,幕府还设立了“蕃书调所”,主译西书。这样,日本虽然仍处于锁国体制下,但在官方的直接支持下，兰学却得到很大发展。在日本兰学家的努力下，兰学很快就从医学领域扩大到天文学、地理学、理化学、博物学等方面，由此日本进入了大规模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

而在闭关时代的中国，随着清政府对外限制措施的日益严密繁苛，中国吸收西学愈加艰难。尤其是在 1720 年,因“教仪”问题，清廷与罗马教皇发生争执,由此导致“禁教”政策的出台,由于耶稣会士是传布西学的最主要媒介体“;西教”被禁,西学也就随之失去了它的寄生体，由此标志着自明朝开始的西学东传局面的结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日本兰学的勃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开国”时代

“开国”是地理大发现、西力东侵和工业革命以来东方国家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意指一个国家放弃“锁国闭关”政策,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所谓“开国”时代,主要是指 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 20 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虽然

为时短暂，但在中日两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折进程中却显得格外重要。

1840 年,英国“东方远征军”为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固守多年的“闭关”体制也被迫宣告结束。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有感于战争惨败，开始放下天朝虚骄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同时开始仿造洋炮、洋船,摄取以“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官僚士大夫的“华夷观念”并未崩溃,战后产生的危机意识也就难以持久。随着 1849 年“反进城斗争”的胜利，清政府中的“攘夷派”又掀起了盲目排外的攘夷运动，遂使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萌生的微弱的开放气氛荡然无存，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攘夷排外倾向仍有增无减。

鸦片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国，却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应，加速了日本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黑船”叩开日本大门,逼迫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结束锁国状态,走向开国。在“开国”时代,日本幕府一面派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一面组织留学生赴西洋留学，以亲身了解和体验西方文化。同时,还大力摄取洋炮、洋船、火车、电报、西服等西方文化,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可见，学术界将日本德川幕府与 19世纪中叶的清政府统视为顽固、保守、排外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4) 维新自强运动时期

19 世纪 60 年代到该世纪末叶，是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

实现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时期。从 60 年代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旗帜,率先发起以摄取西方近代军事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稍后,日本列岛上发生了亚洲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明治维新。由于二者都是以学习西方为手段,试图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因而,学术界对这两大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最为充分。笔者认为,在摄取西方文化问题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根本不同:

其一,在吸取西方文明问题上,日本明治维新采取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并举,多层次的摄取方法。不仅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而且积极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虽然从历史上看,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并不彻底,但毕竟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摄取外来文明的机制,从而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此相比,中国的洋务派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过程中仅仅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丝毫没有兴趣。戊戌变法时重点又落在政治方面,始终缺乏一个系统全面摄取西方文化的纲领和具体操作计划。

其二,两国追求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国内学者武安隆发现:从明治初年开始,日本对外来文化在情绪上呈周期性变化“大约每 20年左右,‘热情吸收期’与‘冷漠抵触期’便要交替出现一次”。[④]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后期,在日本历史上一般称作“文明开化时期”,是近代后第一个“热情吸收期”,其特点表现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狂热追求,出现了疯狂的“留学热”、“旅欧热”、“西方热”、“食牛肉热”等对‘欧风’的狂热追求,甚至出

现了与欧美优秀的白种人通婚的‘人种改良论’和‘废日语论’等极端的提法。在“文明开化”的狂潮中，西方近代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列岛。但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对‘欧化热’的反弹——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又出现了新的‘热情吸收期’。通过这样的‘热冷交替’，日本民族得以在‘欧化热’和‘国粹热’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实现对外来西洋文化的消化。

与此相比，19世纪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洋务派，虽然承认西方近代文明高于中国，但仍认定洋人在‘文武制度’和‘礼义纲常”领域内远远不及华夏，认为只要能将“外人之长技”学习到手，便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即使是在19世纪末叶崛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虽然将‘西人之长技’的范围由‘西器’扩充到‘西政’，但仍不惜笔墨论证西方文化之本源乃在中国，大倡‘西学中源说”，没有出现日本明治维新后由热到冷的态度转化过程。

(5)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40年代，是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极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而相继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比清政府终究多了些现代色彩。因此，在这一时期，日中两国国内已不再就吸取西洋近代物质文明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本土精神文化’和‘西洋外来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等问题展开。

在日本，除了30年代之前十余年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热情吸收西洋文明期’之外，从30年代初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均处于“冷漠抵触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侵略战争的不

断升级，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大力排斥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接触了新的欧洲文化,并急于采用模仿,结果使崇拜欧洲之弊风弥漫全国，对于国体之尊严及皇国古来之文化产生错误的价值认识”。⑤要求不断清除欧洲文化的影响，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论争”,论争的一方为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一方为狂热的“全盘西化论”派，以陈序经为代表。此外还有一部分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折衷论者”,以胡适为代表。从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本位文化”受到“客位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台湾学者殷海光称之为“本土运动”,⑥这场论争实质上探讨的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这既与“九·一八”事变以来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是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摄取西方文化进程的一次理论层面的总结。

（6）战后时代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和日本战败投降，都是两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两国摄取西方文化问题上也是如此。

很多日本学者把因日本战败和美军占领而造成的开放与1853年柏利“黑船叩关”造成的“第一次开国”相比照,称之为“第二次开国”。在美军占领的状态下，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的改革。美式的议会民主制、教育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被输入日本列岛，形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第3个摄取西方文化的“狂热期”。纵观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历

史轨迹,可以发现,日本正是在‘战败国’和‘被占领国’这一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压力面前,通过民主化改革,大力摄取西方文化,并巧妙地利用冷战条件下特殊的国际环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飞跃。

而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则远比日本更为严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封锁以及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关系的破裂,妨碍了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使中国在摄取、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成果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其次,注意深入总结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

从 16 世纪上半叶中日与西方世界开始正规频繁接触,到战后时代,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历时 400 余年,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课题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全面叙述以上 6 个时期两国摄取西方文化具体过程的同时,亦应注意深入总结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以获取有益的现实启示。

笔者认为,总结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应泛泛而论,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就总体而言,日本摄取西方文化比较成功的时期有:(1)‘拉丁文明’时代——揭开了日西关系史的序幕,使日本列岛‘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日本人扩大了视野’。⑦(2)“锁国’时代——锁国虽然一度抑制了西方文化的传入,但却保证了日本列岛长达 200 余年的和平,得以集中消化此前摄取的汉学。同时‘锁国’时代后期兰学的勃兴更使西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以渐进式传入，使日本人传统世界观发生根本性变化。（3）‘开国’时代——吸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教训，开始遣使西洋，大胆摄取西方文化。（4）战后，日本在盟军占领的背景下被强制进行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开始全面摄取欧美现代文明，顺利地引进先进技术，经过消化改造，然后发展起来，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摄取外来文化的模式——“和洋折衷化”。

而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摄取西方文化可以说是教训多于经验。从表面上看，日本举国上下狂热地吸收欧美现代文明，以西洋现代化模式改造日本，使日本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冷静地观察分析这些“巨变”，就会发现此时期日本摄取西洋文化的总体方略是失败的。早在民国年间，胡适就已看出，日本统治者中“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这种‘东洋精神，西洋技术’的现代化模式排斥了西方的精神特质，造成日本战前现代化的畸形发展，结果给日本带来了1945 年的灾难，导致日本现代化发生严重的中断。应该说，这是19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摄取外来文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而在中国历史上，明季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与耶稣会士合作译书，率先揭开中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序幕，使中国在“拉丁文明”时代接触到的西洋文化品位较高，其首创之功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随着南京教案的发生，中西文化冲突渐趋激

化，使西学东传的势头衰减直至中断。在 19 世纪中叶的‘ 开国 ’时代,中国曾涌现出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一批‘ 开眼看世界 ’的伟大思想先锋人物，撰写出一批管窥西洋世界，探讨御侮自强的精品之作,但遗憾的是,这股进步浪潮也并未持续下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世纪名著在华夏大地倍受冷落，相反却在东邻日本大受青睐,坊市翻刻,不胫而走。中国的‘ 精英文化 ’在本土受挫，在异国却大放异彩，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剧。到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摄取外来文化只是停留在“ 器物 ” 文明层面，始终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

综合观之,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朝野人士,尤其是封建士大夫,在传统的世界观影响下，一直深深地陶醉于“ 天朝意识 ” 的传统观念之中，陷于“ 中国中心论 ” 难以自拔，直接阻碍了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行程。应该说这是最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再次，注意结合文明结构理论和文明传播理论，对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做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因而，当我们试图通过世界文明结构理论和文明传播理论，以深化中日摄取西方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时，必须首先对世界学术界有关区域文明研究的主要学派及观点做一简要的回顾。

从 20 世纪初至今,世界上很多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都殚精竭虑地致力于人类文明空间分布的结构和规律研究，

提出了“文化层”“文化丛”“文化区”“文明圈”“文化模式”等概念,其中“文化圈”(又称“文明圈”)理论影响最大。

“文化圈”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德奥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学者施密特提出的。格雷布内尔是德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传播论者。他于 1911 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民族学方法论》一书,开创了德奥历史学派。他一生最具学术影响的观点是提出了“文化圈”和“文化层”理论。他认为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之间,彼此有着历史的联系,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圈”的重叠便构成“文化层”,它体现了文明的纵向发展轨迹。在对世界上主要“文化圈”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他断言:“文化圈”在全世界的传播,其根本原因是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文化最初只产生于少数几个地区,为少数几个优秀民族所创造。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文化都是从这些民族的文化传播过来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圈”移动、结合的历史。

施密特在学术上继承了格雷布内尔的“文化圈”理论,宣传文化“一次发生论”和“传播论”,在更大范围内扩展了“文化圈”概念的内涵。他所阐述的文化圈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同时也包括物质文化以及社会风俗、伦理道德、宗教等人类各种文化范畴,是指“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各种文化特质构成的有机体”。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德奥历史学派那里,所谓“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别,是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以程度不等的聚结形式在地球上广泛传播的结果。

“文化圈”理论形成后,曾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界产生轰动效应。

但因其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为了复原历史而构造出来的，主观主义色彩极其浓厚，遭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后逐渐走向衰落。

继德奥历史学派“文化圈”理论之后，以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说”影响最大。这两位著名学者在著作中使用的最基本概念是“文化”和“文明”。1917 年 12 月，施宾格勒出版了其成名之作《西方的没落》，在书中作者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过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施氏的最杰出贡献在于把世界的各种文化分为 8 种，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他认为，当一种文化到达全盛时期，便衰退为文明，文明是一种衰亡的结局。除了西方文化外，其他 7 种文化都已衰亡，作为最后一种的西方文化也正处于衰亡的阶段。全书虽然充溢着作者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悲观预测，但其对人类文明空间分布的观点却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创了一种以“文化”(“文明”)为研究单位的新的世界史编纂模式。

1934 年，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在其宏篇巨著《历史研究》中，将施宾格勒的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将世界文明按区域分为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 21 种文明进行研究。后来又把文明的数量扩大到 37 个。在汤氏看来，“西方文明毕竟只不过是它这一类文明中的 21 个代表之一”。⑨从而打破了欧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世界史坛掀起了一股“区域文明”研究的风潮。受其影响，很多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开始从民族国家体系转向区域文明体系，诞生了像布罗代尔《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斯托扬诺维奇《巴尔干文

明研究》等一批代表作，开辟了世界史坛的新纪元。

“文化圈”(文明圈)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比较研究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及规律应该说具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1）关于研究视野

与传统的史学方法不同，“文明圈”理论首先为人们提供了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观察问题的宏观视野。1934 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序论里就曾指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是文明，以往人们研究历史都是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这样的研究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问题。要研究文明问题，历史研究的范围就应大大扩展。从文明角度看，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局部，对局部的研究无法说明整体，只有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的研究范围。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文明)。”法国、德国、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不能得到认识和理解的；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如果不放在东南亚的历史体系中，同样也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以此思想为统辖，笔者认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碰撞、交汇和融合，已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质的“东亚文化圈”。在文化上，东亚世界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日本和朝鲜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政治文化思想。从 19 世纪中叶起，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东侵的压力下，东亚各国先后被迫结束“闭关锁国”状态，开始了以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但从历史

结果看,中、日、朝三国的现代化命运是迥然不同的,分析其成败缘由，已成为学术界久谈不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要想对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命运做出有说服力的学术阐释，当然应该对各国摄取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深入细致的“国别个案”研究，但目前更重要的应是跳出“国别史”的框架，把中日两国的现代化问题放到整个东亚历史的大体系当中，对不同的社会层面摄取西方文化的理念、心态、措施、典型运动等用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系统论等方法进行宏观比较研究，这样才能深化历史认识，对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命运问题做出深层次的阐释。在这一意义上，“文明圈”理论为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分析研究中日摄取西方文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借鉴。

(2) 关于文明结构层次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各区域文明体系内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出现‘中心文明’和‘边缘文明’问题。

在众多的文化学和经济学研究著述中，虽然有些学者时常提及‘中央与末梢’、‘核心与外围’、‘中心与外围’、‘核心与边陲’等概念,但是却很少有学者从文明结构角度对‘中心文明’和‘边缘文明”的概念及其结构性特征进行科学详尽的论证。真正从文明内在结构的宏观视角来阐释文明“中心一边缘”特性的，应首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C. 弗斯勒和中国学者盛邦和。

在弗斯勒那里,‘文化中心’(即中心文明)是指‘一个文化区特有的文化特质最集中的部分。每一文化区域都有一个中心，这个文化中心是动态的，具有辐射出去的文化力量，文化区的文化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